心理学报 2023, Vol. 55, No. 7, 1–17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01

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及宏观成因*

王祥坤[1] 辛自强[2] 侯 友[1]

([1]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1517) ([2]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脱离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倾向, 它往往是在为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寻找借口。以往研究主要在个体水平上考察道德推脱的成因和后果, 很少关注它的历史变迁趋势及其宏观成因。本研究对以 Bandura 和 Caprara 等人的道德推脱量表为工具的已有研究进行两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分别考查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及其与反映社会个体化水平和正义水平的宏观因素的关系。研究 1 发现, 在 2010 至 2021 年间, 我国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研究 2 发现, 在 2008 至 2020 年间, 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两项研究中, 社会个体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和社会正义水平(现行有效立法量)的上升趋势均能显著负向预测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综上, 近 10 年来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 这可能与社会个体化水平(强调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自主责任)和社会正义水平(对行为更多的外部约束)上升有关。

关键词 道德推脱, 个体化, 社会正义, 大中学生, 社会变迁, 横断历史元分析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立德”是学校育人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大中学生处于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Killen & Smetana, 2013), 做好德育工作的前提是了解和掌握他们的道德发展特点和变迁趋势。道德心理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是道德推脱, 它反映了个体因道德自我调节失效而表现出的推卸自身道德责任的行为, 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可从两个层面入手, 一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发展研究, 二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研究。以往研究在个体层面对道德推脱年龄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 但在宏观层面对道德推脱的社会变迁及其成因的研究明显不足。鉴于此,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查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社会变迁趋势及可能的宏观成因, 以便为揭示我国社会道德变迁趋势提供量化研究证据。

1.1 道德推脱理论与操作性定义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通过推卸自身道德责任以达到合理化不道德行为的认知倾向(Bandura, 1990; Treviño et al., 2014), 包括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使其伤害性减小、极力摆脱自己在不当行为后果中所担负的责任和努力抑制自身对给受害者造成痛苦的认同感(Bandura, 1999; Bandura et al., 2001)。道德推脱理论是 Bandura (1990, 1999)对先前研究工作的理论化总结。该理论起初主要是将道德推脱作为一种认知过程(Bandura et al., 1996a; Luan et al., 2022), 以解释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潜在心理机制：当人们的自身道德标准脱离社会道德标准时, 就可能发生不道德行为(Bandura et al., 1996a; Chen et al., 2016)。该理论认为, 道德推脱通过破坏两个关键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来实现(Bandura, 1990)。首先, 道德推脱可以阻止人们进行道德判断与推理等认知活动(Leidner et al., 2010; Moore et al.,

收稿日期: 2022-08-18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XNKJ01)。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B21006)。响应《心理学报》开放科学倡议, 本文数据上传至：https://osf.io/x27uz/

通信作者: 辛自强, E-mail: xinziqiang@sohu.com

2019)。例如，道德推脱会抑制个体的道德责任意识、道德行为动机和道德判断能力(Graca et al., 2016; Sheldon et al., 2018)。其次，道德推脱会抑制人们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的负性道德情绪体验(Aquino et al., 2007; Harris & He, 2019; Sharvit et al., 2015)。例如，人们会因道德推脱而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更少体验到自责、内疚等情绪(Hillebrandt & Barclay, 2020; Ogunfowora, Nguyen, Lee, et al., 2022)。

此后，学者们沿用了这一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并将“道德推脱”作为一种稳定的认知倾向或人格特质来分析，侧重评估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差异(Moore, 2015)。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将道德推脱操作性定义为对 8 种常用的道德推脱行为策略的使用频率，频率越高表明人们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或行为倾向越强。这 8 种道德推脱行为策略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忽视或扭曲结果、责任转移、责任分散、责备归因、非人性化(Bandura et al., 1996a 1996b; Caprara et al., 2009; Chen et al., 2020)。例如，人们可能会将不道德的行为证明为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的(道德辩护)，使用无伤大雅的语言以不具威胁性的方式描述行为(委婉标签)，或通过将其与更严重的违规行为进行比较来降低其道德严重性(有利比较)；个人还可能会将不道德行为有害影响的证据最小化或忽视(扭曲后果)，通过声称听命于权威人物而摆脱对违法行为的个人责任(责任推卸)，或者躲在集体决定或集体行动的后面(责任分散)；个人也可能会与受害者保持距离，指责他们招致对自己的报复(归罪于受害者)或非人性化对待受害者(非人化)。这种操作性定义方式实际上隐含在了 Bandura 及此后其他学者开发的包含 8 个维度的道德推脱量表中，这些工具被广泛用于评估人们的道德推脱水平或行为倾向(Bandura et al., 1996a; Boardley & Kavussanu, 2007; Caprara et al., 2009; McAlister, 2001)。以往研究者认为道德推脱各维度具有一致的心理过程机制(Bandura et al., 1996a)；而且实证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各维度之间以及它们与量表总分之间具有中等以上的相关性(Caprara et al., 2009)，例如，以国内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相关系数分别在 0.35 至 0.59 之间和 0.67 至 0.76 之间(滕召军, 2018)。道德推脱量表各维度之间中等以上的共变关系意味着如果能揭示量表总分的变迁趋势，则该趋势也很可能适用于具体维度，反之亦然。

1.2 道德推脱与社会道德水平的关系

道德推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社会道德水平。在社会现实层面，道德水平的高低由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决定，而道德底线体现为社会中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数量(李侠 等, 2020; 宋洪兵, 2009)。不道德行为越多则说明道德水平或道德底线越低，反之则意味着道德水平越高。以往研究发现，道德推脱预示着更多不道德行为(Chen et al., 2016; Kavussanu & Stanger, 2017; Kowalski et al., 2014; Ma et al., 2019; Machackova, 2020)。例如，以 366 名 14 至 20 岁的青少年为被试的纵向研究发现，具有较高道德推脱倾向的青少年在青春期后期更有可能表现出频繁的攻击性和暴力行为(Paciello et al., 2008)；另一项针对男性青少年罪犯的追踪研究发现(N = 1169)，道德推脱水平降低则反社会行为和客观记录的违法水平也下降(Shulman et al., 2011)。

元分析研究给出了更为系统的结果。一项有关儿童、青少年的元分析发现，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28; Gini et al., 2014)；另一项包含更大年龄范围(包括成人)和更多中国文化背景下实证研究的元分析显示，二者确实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王兴超 等, 2014)。两项元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年龄组和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推脱与不道德行为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会破坏人们的道德责任意识(Pouwels et al., 2019; Reynolds et al., 2014)。而道德责任意识越强，人们越能抑制道德推脱行为(Gino et al., 2011; O’Fallon & Butterfield, 2005)，其结果是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较高的道德水平(李建德, 罗来武, 2004; Hannah et al., 2011)。综上可知，若道德推脱水平降低可能意味着社会道德水平上升(道德提升)；反之，则可能意味着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滑坡)。下面从社会变迁角度具体分析道德推脱水平变迁趋势及可能的宏观成因。

1.3 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

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继续稳步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社会转型趋势更加明显。宏观经济社会变迁会带来民众心理与行为在社会时间尺度上的变化(Greenfield, 2016; Hamamura, 2020)，是为心理变迁。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众在很多心理变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变迁趋势，如文化价值观(蔡华俭 等, 2020; Zeng & Greenfield, 2015)、各种心理健

康指标(辛自强, 池丽萍, 2020)和各类社会心理特征(池丽萍, 辛自强, 2020)。很多学者相信, 无论是个体的道德责任意识, 还是社会的道德规范, 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厉以宁, 2010; Ayala, 2010; Haidt, 2007)。影响人们道德责任意识的道德推脱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特征(杨文登, 梁爽, 2022; Bandura et al., 1996a), 也可能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总结以往研究, 目前尚缺少有关我国民众道德推脱水平变迁趋势的直接证据, 最相关的理论基础则是已有的道德滑坡模型。

道德滑坡是指人们的道德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滑(欧红蕾　等, 2020; Welsh et al., 2015)。道德滑坡模型指出, 我国社会道德水平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滑坡趋势, 表现为道德失范现象增加、道德责任缺失行为上升。例如, 有学者指出,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或道德溃败(孙立平, 2007)。一项有近 10 万人参与的凤凰网组织的调查显示, 87.7%的民众认为我国社会道德水平是"道德滑坡" (即存在道德滑坡现象)而非"道德提升" (即主流社会道德风貌向好) (包刚升, 2012)。企业领域曾一度持续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群体性败德行为, 表明社会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李新春, 陈斌, 2013); 也有研究发现心理咨询师行业中网络广告宣传存在伦理风险, 如咨询费用和广告内容存在道德风险的比例为 72%和 54% (朱焕雅　等, 2022)。这些证据似乎均表明我国社会存在道德滑坡。此外, 除了这些直接的证据, 有关人际互动和财经伦理的间接证据可能也支持社会道德滑坡的假说。例如, 多项横断历史研究揭示了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下降趋势(辛自强, 2019; Xin & Xin, 2017; Zhang & Xin, 2019); 基于历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 我国公民财富价值观增强(更趋向追求财富), 而财经伦理观弱化, 表现为人们更认同通过竞争获取财富并且更能容忍不道德的财经活动(辛自强, 李哲, 2020)。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不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Hoffman et al., 2015; van Lange & Rand, 2022), 而财经伦理观弱化意味着社会更加接受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失范行为, 这些证据说明我国民众可能越来越趋于漠视自身道德责任并变得不再信守道德原则。上述直接和间接证据均能支持道德滑坡模型, 若基于该模型来推理, 作为一种道德心理的道德推脱, 其水平可能呈现上升趋势, 即随着社会变迁, 人们更倾向于做出道德推脱行为。

然而, 并不是所有证据都支持道德滑坡观点。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道德提升"模型。例如, 新近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道德责任意识(如责任心) (田园　等, 2017; Peng & Luo, 2021)和道德情绪(如共情) (颜志强　等, 2017)呈现持续改善趋势, 这可能预示着民众道德推脱水平呈降低趋势。

首先来看责任心的上升趋势。责任心代表个体积极进取、组织力强、行为谨慎等认知倾向(Goldberg, 1990)。责任心强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Cohen et al., 2014), 也更加重视公平公正, 强调规则意识, 遵守道德规范(Ogunfowora, Nguyen, Steel, et al., 2022); 而个体的责任心越弱则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越低(de Angelis et al., 2016)。这意味着责任心可能会通过不断强化人们的道德责任意识来抑制其自身的道德推脱倾向。横断历史元分析发现, 2004 至 2013 年我国大学生大五人格因子的责任心维度得分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幅度超过 1 个标准差(田园　等, 2017)。另一项时间跨度更长的横断历史元分析也表明, 在 2001 至 2016 年间, 大学生责任心维度得分呈显著上升趋势(Peng & Luo, 2021)。两项研究均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学生责任心均呈显著上升趋势, 这可能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推脱水平在降低。

其次, 人们的共情水平似乎也在提高。共情作为个体美德的表现(Wang & Todd, 2021), 是指能够对他人的需要或痛苦做出积极回应的道德情绪(de Waal, 2008; Zaki, 2020)。当个体共情能力受到抑制时, 就会导致更多的非人化倾向(道德推脱机制中的一种)和不道德行为(Lee et al., 2019)。而共情能力越高的个体, 其道德推脱水平就会越低(符婷婷　等, 2020; Camilleri et al., 2020; Detert et al., 2008)。一项研究发现 2009 至 2015 年间我国大学生共情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年代的解释率为 19.00%), 共情平均得分上升了 8.30(d 为 0.94) (颜志强　等, 2017)。共情水平的上升趋势可能也意味着道德推脱水平呈下降趋势。

综上, 责任心和共情的上升趋势可能预示着个体推脱自身道德责任的倾向减少, 符合道德提升模型, 具体到道德推脱水平, 它应呈现降低趋势。这可能与新世纪以来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上升有关, 下文具体分析。

1.4　影响道德推脱水平变迁的宏观因素

基于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Greenfield, 2016)和社会生态心理学理论(Oishi, 2014), 宏观社

会环境及其变迁因素会影响人类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我们预期社会的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等变迁因素也可能会减少或限制人们的道德推脱倾向。

1.4.1 社会个体化水平的影响

个体化已然成为依赖于市场、法律和教育的最发达社会化形式的全球趋势(贝克, 20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不断走向个体化(解彩霞, 2018; 阎云翔, 2016; 杨雪晶, 2015; 张良, 2017)。社会个体化是指个人由只能依附于群体的社会成员转变为不依附于群体的独立个体的社会变迁过程(贝克, 2011; 阎云翔, 2016)。也就是说，相对于社会群体而言，社会个体化将社会成员铸就成个体，使得个体自身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集体的一分子，而作为另一个独立的社会范畴而存在。社会个体化程度的高低以社会的个体化水平来代表。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性推动了我国社会个体化进程(阎云翔, 2016)，这表现为社会的个体化水平不断上升(冯莉, 2014; 文军, 2012)。

由于社会的个体化水平不能被直接量化考查，所以我们以经济市场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作为其代理指标来客观反映社会的个体化程度(赵爽, 2011; Santos et al., 2017)。首先，市场化。我国的市场化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樊纲 等, 2003)，它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樊纲 等, 2011)，也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的经济行为都应是理性、自主的，且要自行承担行为后果(孙春晨, 2013)。市场经济活动以货币作为等价交换媒介，既凸显了地位平等也扩大了个人自由；货币使用也让人们避免依附他人或群体，从而提高了个人自主性。这意味着经济市场化程度(以市场化指数衡量)越高就越强调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增强了社会的个体化水平。其次，城镇化。城镇化是反映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不断上升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增强的社会流动性促进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城镇化水平的持续上升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最后，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社会流动性增加使得个体对原有的家庭(族)、亲属关系和地方社区发生“去依附”的过程，其社会关系结构趋于“原子化” (王建民, 2013; 阎云翔, 2021)。这也表现在家庭婚姻关系层面，个体为追求“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以离婚或不婚的方式来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其后果之一表现为社会整体的离婚率上升而结婚率降低(唐灿, 2005; 杨菊华, 何绍华, 2014)。由此，可以用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来反映人际关系结构的个体化程度(Hamamura, 2012; Santos et al., 2017)。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个体化能够通过增强个人自主责任意识(Mazar & Aggarwal, 2011)和道德责任意识(郑富兴, 2011)，进而会有助于抑制人们的道德推脱行为(Gino et al., 2011; O’Fallon & Butterfield, 2005)，但目前尚缺直接证据支持社会个体化对道德推脱倾向的抑制作用。我们预期社会的个体化水平提高可能会通过强化自主责任意识来减少人们的道德推脱倾向，故而道德推脱水平会有所下降。因此，本研究选择市场化指数、城镇化率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作为社会的个体化水平的代理指标来预测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

1.4.2 社会正义水平的影响

除了社会个体化水平的影响，社会正义水平也会以法律和道德规范来限制人们的道德推脱行为(Lee et al., 2016; Moore & Gino, 2013)。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推动以立法形式维护社会正义，化解当前社会面临的困境和矛盾(黄玉顺, 2012; 叶航, 2012)。罗尔斯认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葛宇宁, 2017)。社会正义通过以制度的方式确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体现，并通过分配由国家支配的资源、机会和利益来实现(姚大志, 2013)，它通常以法律和道德形式来表达(窦炎国, 2008)。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引导民心、导民向善；法律规制社会、调整行为。完善的法制体系、清晰的道德规范体现了社会正义水平(窦炎国, 2008; 周旺生, 2004)，它们构成了对个体行为良好的外部约束，这种约束机制有助于限制人们的道德推脱行为(Lee et al., 2016; Moore & Gino, 2013)。

在社会层面，能够体现社会正义的制度性约束力量是法制化。法制化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它首先体现为国家以立法形式持续完善法律体系的过程。立法是法治之先导，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若没有完善的法律条文，显然更可能存在社会正义水平低下问题。因此，只有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黄文艺(2022)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工作不但没有减缓节奏，

反而进一步提速。与上个 10 年相比, 新制定的法律数量增加了 1/3, 修改法律数量增加了近两倍,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增加了 1.5 倍。”由此可见, 立法数量是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程度的直接指标, 也相当程度上体现着社会正义水平。本研究选择现行有效立法量作为社会正义水平的代理指标, 以考察其对道德推脱水平的预测作用。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思路

本研究将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查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并揭示其宏观成因。研究的必要性有两点: 第一, 从研究方法来看, 以往关注社会道德变迁问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更多是进行理论或质性分析(阎云翔, 2019; 阎云翔, 郎帅, 2016; 阎云翔, 徐大慰, 2010), 而横断历史元分析可以对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进行定量分析; 第二, 分析影响道德推脱水平变迁趋势的社会因素, 有助于建立宏观水平的解释模型。本研究共包括两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它们分别以中学生(研究 1)和大学生(研究 2)为研究对象。选择大中学生主要有两点考虑: 其一, 大中学生道德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他们作为新的一代成长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 更容易受到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 其二, 文献的可得性使然, 目前只有大中学生道德推脱的研究较为集中, 这些原始文献可以提供元分析所需的数据。我们在研究中拟将中学生和大学生分开考查,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是因为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测量工具。因此, 本研究分别分析中学生和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 并以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来解释道德推脱水平的变化。

2　研究 1: 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变迁的横断历史元分析(2010 至 2021 年)

2.1　研究方法

2.1.1　文献的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选文献的研究工具均为 Bandura 等人编制的道德推脱量表的中文修订版(杨继平, 王兴超, 2012)。该量表包括 32 个题目(例如, 与打人相比, 损害些东西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采用李克特 5 点量尺记分(1 代表非常不同意; 5 代表非常同意)。计分方式是将所有题目得分加总, 总分取值范围为 32 至 160(总分除以项目数来求取平均值后得分范围在 1~5 分),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

2.1.2　文献收集标准和结果

文献收集采取如下标准: (1)研究必须使用 Bandura 等人编制问卷的中文修订版; (2)研究报告中有明确的量化统计指标(包括样本量、变量均值与标准差); (3)研究对象均是我国(内地)在校的中学生(包括初中生、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 (4)文献收集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5)同一篇文献若采用追踪研究数据, 则只录入首次测量数据; (6)同一作者发表的不同文章, 如果是同一批数据, 那么只选最早的一篇。

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资讯、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 等中外文献数据库中, 分别以“道德推脱”、“初中生道德推脱”、“高中生道德推脱”、“中学生道德推脱”和“青少年道德推脱”等中文及相应英文词语进行全文检索, 最终共得到 75 篇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其中有 6 篇文献分别包含 2 项子研究, 合计 81 组数据)。在这些文献中, 文献作者自测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范围在 0.82 至 0.96 之间。这些文献发表时间在 2012 至 2022 年间。除注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代的文献外, 发表的期刊论文数据收集年代(简称“年代”)均按照发表的年代减去 2 年的方式计算, 而学位论文年代均按照实际出版年代减去 1 年的方式计算。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年代跨度为 2010 至 2021 年, 涉及 60478 名中学生被试, 文献收集的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学生道德推脱收集文献数据组数

收集年代	数据组	样本量
2010	1	756
2012	1	754
2013	3	2042
2014	5	4719
2015	11	7091
2016	11	6821
2017	14	7126
2018	12	11322
2019	9	9511
2020	12	9352
2021	2	984
总计	81	60478

2.1.3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本研究建立数据集的方法是: (1)赋予每个数据组唯一编号并把所有文献的基本数据(N, M, SD)、发表年代录入数据集(若提供的是所有项目的总均

分，则录入数据时以总均分除以项目数获得测验的平均值 *M*); (2)对文献的其他信息进行编码，包括文献类型(1=核心刊物，2=一般刊物，3=学位论文或论文集，4=外文期刊)、数据收集地区(1=西南地区，2=西北地区，3=东北地区，4=华北地区，5=华中地区，6=华东地区，7=华南地区，8=未报告或者跨地区)和被试生源地(0=无明确城乡信息，1=城市，2=农村，3=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等信息。数据编码录入与数据核查分别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独立完成。出现不一致的地方，由二者共同查找原文并对照编码商讨核对修改，以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对只提供子研究结果数据(如性别分组数据或分维度数据)而没有提供总研究结果数据的文献，按照下面两个公式($\bar{x}$、S_T、n_i、x_i、S_i 分别代表：合成后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研究的样本量、以及子研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对子研究结果进行加权合成：

$$\bar{x} = \sum x_i n_i \Big/ \sum n_i \tag{1}$$

$$S_T = \sqrt{\left[\sum n_i S_i^2 + \sum n_i (x_i - \bar{x})\right] \Big/ \sum n_i} \tag{2}$$

参照以往研究中对原始分数进行百分比或标准分数 *Z* 分数转换的做法(Cai et al., 2022; Twenge et al., 2014)，本研究将道德推脱平均分转换为标准分 *Z* 分数(均值为 0，单位为 1) (Twenge et al., 2014)，以便与研究 2 保持一致的分析单位。此外，若 *Z* 分数超过 3 个标准差被视为异常值，按照经验做法应予以删除。

2.1.4 社会因素指标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历年的市场化指数、城镇化率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等指标作为社会的个体化水平指标；选取现行有效立法量来代表社会正义水平。市场化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方面内容，该指数取自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https://cmi.ssap.com.cn/)。城镇化率是通过计算我国每年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率获得；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是通过计算每年离婚数(万对)与结婚数(万对)之比获得，这些指标所需的统计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https://data.stats.gov.cn/)。现行有效立法量是指当年有效的立法总数量(现行有效是对法律文件时效性的规定)，该指标取自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gov.pkulaw.cn/)。

2.2 研究结果

2.2.1 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首先，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中有 2 个数据点超过 3 个标准差(异常值均为 3.88)，因此，将异常值剔除之后对剩下 79 个数据组进行分析，以考察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图 1 的散点图描述了两者的关系。通过计算年代与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的相关系数来量化描述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41, 95% CI = [−0.58, −0.20], R^2 = 0.17, p < 0.01)。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对年代的回归分析表明，年代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14, SE = 0.04, $t(77)$ = −3.89, p < 0.01, 95% CI = [−0.21, −0.07], β = −0.41, R^2 = 0.16)；而对样本量加权控制后进行回归分析，两变量之间仍呈显著负相关(b = −0.16, SE = 0.04, $t(77)$ = −4.12, p < 0.01, 95% CI = [−0.23, −0.08], β = −0.43, R^2 = 0.18)。由此可知，2010 至 2021 年，我国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降低趋势。不过，鉴于本文所分析的个别原始研究的样本量极端偏大，可能过分放大了这些研究均值或 *Z* 分数的作用，造成回归系数的较大偏差，这时不做样本量加权控制会更合理，因此，我们以未控制样本量的研究结果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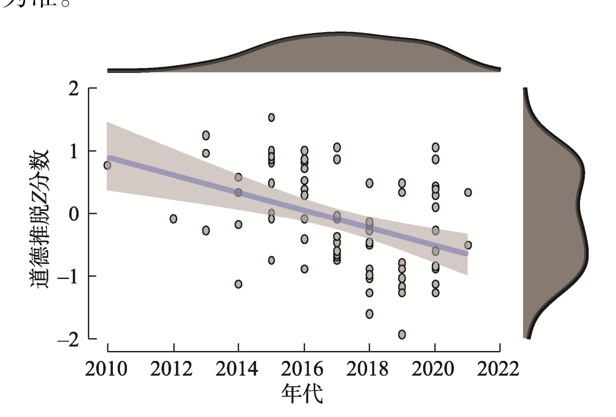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与年代相关

注：图中阴影表示 95%的置信区间分布带；右侧和上方阴影面积分别表示道德推脱和年代的密度分布图，下同。

接着，我们对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随年代的变迁趋势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首先，我们采用怀特稳健标准误的统计参数校正方法(以 R-fixest 包分析)进行统计检验，以排除道德推脱得分数据跨年代不独立问题，校正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14, SE_{Het_Robust} = 0.04, 95% CI = [−0.22, −0.07], R^2 = 0.16, p < 0.01)。其次，

我们对文献类型、数据收集地区、被试生源地(转化为虚拟变量)进行统计控制,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期刊类型(b = 0.04, SE = 0.09, t(74) = 0.41, p > 0.05, 95% CI = [−0.14, 0.21], β = 0.04)、数据搜集地区(b = −0.02, SE = 0.04, t(74) = −0.38, p > 0.05, 95% CI = [−0.09, 0.06], β = −0.04)和生源地信息(b = 0.36, SE = 0.24, t(74) = 1.47, p > 0.05, 95% CI = [−0.13, −0.84], β = 0.16)均无显著的预测作用; 而控制这些变量时, 年代仍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0.15, SE = 0.04, t(74) = −4.07, p < 0.01, 95% CI = [−0.22, −0.08], β = −0.43, ΔR^2 = 0.18)。最后, 我们以 79 组中的 47 个有效数据对中学生年龄进行统计控制,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年龄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 = 0.23, SE = 0.07, t(44) = 3.32, p < 0.01, 95% CI = [0.09, 0.37], β =0.42), 年龄越大道德推脱水平越高, 但此时年代仍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0.11, SE = 0.05, t(44) = −2.33, p < 0.05, 95% CI = [−0.21, −0.02], β = −0.30, ΔR^2 = 0.09)。总之, 以上结果均说明, 2010 至 2021 年, 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变迁出现稳健的下降趋势。

2.2.2　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随年代的变化量

本研究中, 我们以 d_Z 来近似计算 Z 分数的效应值, 并以标准分数来描述效应量(不采用 Cohen’ d 值的经验标准来评估 Z 分数的效应量)。首先, 以中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为因变量(Y), 以年代为自变量(X), 从而建立回归方程: Y = BX + C (具体方程结果为 Y = −0.14X + 286.13)。其次, 分别将年代 2010 和 2021 代入回归方程获得中学生道德推脱的 Z 分数 Z_{2010} 和 Z_{2021}。最后, 计算 Z_{2021} 和 Z_{2010} 之差, 再除以 11 年间的 Z 分数的平均标准差 1 (因为标准分的标准差为 1, 所以 11 年间的平均标准差也为 1), 即可得到 d_Z 值为−1.54 ($d_Z = (Z_{2021} - Z_{2010}) / 1$)。结果表明, 11 年来中学生道德推脱下降了 1.54 个标准分。

2.2.3　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与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水平的关系

我们采用滞后相关分析方法分别依次单独考查 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水平对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的预测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均能负向预测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趋势。

3　研究 2: 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变迁的横断历史元分析(2008 至 2020 年)

3.1　研究方法

3.1.1　文献的研究工具

以往研究文献采用 3 个版本的量表来评估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第一, 包含 32 题版的 Bandura 等人编制的中文修订版量表(杨继平, 王兴超, 2012)。第二, 包含 26 题版的 Bandura 等人编制的中文修订版量表(王兴超, 杨继平, 2010)。这两个修订版的量表的记分规则是 5 点记分(1 代表非常不同意; 5 代表非常同意), 所有题目分数相加, 总分取值范围为 32~160 或 26~130 (总分除以项目数来求取平均值后得分范围在 1~5 分),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第三, 基于 Caprara 等人编制的中文修订版包括 32 题, 记分规则同上(王兴超 等, 2013)。

我们将这 3 个版本工具测量得分结果数据分别转换为 Z 分数, 再合并成一个总数据库。将三者合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 3 个量表的理论构念相同, 测量形式一致。这 3 类量表均是遵循 Bandura 等人提出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主张, 测量的结构均包括 8 个推脱机制。修订后量表采用了相同的测量形式, 记分方式均采用李克特 5 点量尺记分。其二, 不同类型数据结果合并可以充分挖掘数据信息。以往

表 2　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水平与中学生道德推脱的相关

社会成因	3 年前			1 年前			当年		
	β	t	p	β	t	p	β	t	p
社会的个体化水平									
市场化指数	−0.40	−3.88	< 0.01	−0.37	−3.49	< 0.01	−0.38	−3.58	< 0.01
城镇化率	−0.40	−3.83	< 0.01	−0.40	−3.83	< 0.01	−0.34	−3.17	< 0.01
离−结婚比率	−0.36	−3.34	< 0.01	−0.40	−3.88	< 0.01	−0.44	−4.22	< 0.01
社会正义水平									
现行有效立法量	−0.28	−2.51	< 0.05	−0.42	−4.10	< 0.01	−0.41	−3.90	< 0.01

注: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样本量为 79; 离−结婚比率为离婚率与结婚率的比值, 下同。

表 3 大学生道德推脱收集文献数据组数

收集年代	汇总后的数据组数		基于 Bandura 量表的 26 题版数据组数		基于 Bandura 量表的 32 题版数据组数		基于 Caprara 量表的 32 题版数据组数	
	数据组	样本量	数据组	样本量	数据组	样本量	数据组	样本量
2008	1	529	1	529	–	–	–	–
2010	2	880	–	–	–	–	2	880
2011	2	1163	1	668	1	495	–	–
2012	3	1781	1	431	2	1350	–	–
2013	2	1113	2	1113	–	–	–	–
2014	3	2261	2	1562	–	–	1	699
2015	7	3683	3	1737	2	976	2	970
2016	2	1134	–	–	–	–	2	1134
2017	9	4918	3	2248	5	2394	1	276
2018	12	8508	3	2213	4	3481	5	2814
2019	9	7303	4	3247	4	3049	1	1007
2020	2	951	–	–	2	951	–	–
合计	54	34224	20	13748	20	12696	14	7780

研究为汇总不同测量得分，常用的转换方法包括百分比和 Z 分数等。例如，不同类型生活满意度得分(Cummins, 1995; Li & Raine, 2014)和幸福感得分(Cai et al., 2022)的最大量尺百分比转换方法，以及信任感得分的标准分数转换方法(Twenge et al., 2014)。这样既可以避免因某单个数据集样本数量的限制得出有偏的结论，也可以避免因对多个数据文件单独分析导致结果无法汇总比较。我们参考 Z 分数转换的方法将以上 3 个版本道德推脱量表得分结果合并。

3.1.2 文献收集标准、数据整理和社会因素指标选取

文献收集、编码及社会因素指标来源等操作步骤同研究 1。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资讯、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 等中外文献数据库中分别以“道德推脱”、“大学生道德推脱”和“公民道德推脱”等中文及对应的英文词汇进行全文检索，最终共得到 52 篇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其中有 2 篇文献分别包含 2 项子研究，最终有 54 个数据组)。在这些文献中，文献作者自测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范围在 0.76 至 0.97 之间，发表时间在 2010 至 2021 年间。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年代跨度为 2008 至 2020 年，共涉及 34224 名被试，文献收集的具体情况如表 3 (最左侧 1 至 3 列)所示。

3.2 研究结果

3.2.1 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首先以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图 2)，然后计算两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46, 95% CI = [−0.65, −0.22], R^2 = 0.21, p < 0.01)。大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对年代的回归分析表明，年代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16, SE = 0.04, t(52) = −3.73, p < 0.01, 95% CI = [−0.24, −0.07], β = −0.46, R^2 = 0.21)；对样本量加权控制后进行回归分析，二者也呈显著负相关(b = −0.23, SE = 0.05, t(52) = −4.48, p < 0.01, 95% CI = [−0.34, −0.13], β = −0.53, R^2 = 0.28)。由此可知，2008 至 2020 年，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此外，与研究 1 相同的是，个别极端偏大的样本量导致样本量加权回归分析后的预测系数出现一定偏差(与未加权样本量回归分析相比)，故仍以不作样本量加权控制的回归分析结果为准。

此后，我们对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随年代的下降趋势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为排除道德推脱得分数据跨年代不独立，采用怀特稳健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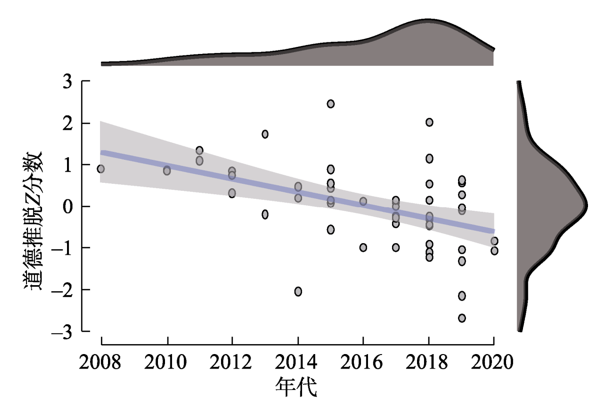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与年代相关

误的统计方法校正，控制后的分析结果发现，年代负向预测作用仍显著(b = −0.16, SE_{Het_Robust} = 0.04, 95% CI = [−0.24, −0.07], R^2 = 0.21, p < 0.01)。其次，控制文献类型、数据收集地区、被试生源地(转化为虚拟变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期刊类型(b = −0.01, SE = 0.13, t(49) = −0.06, p > 0.05, 95% CI = [−0.26, 0.25], β = −0.01)、数据搜集地区(b = −0.03, SE = 0.05, t(49) = −0.50, p > 0.05, 95% CI = [−0.13, 0.08], β = −0.06)和生源地信息(b = 0.06, SE = 0.31, t(49) = 0.19, p > 0.05, 95% CI = [−0.57, −0.68], β = 0.03)均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此时年代依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 = −0.16, SE = 0.05, t(49) = −3.11, p < 0.01, 95% CI = [−0.26, −0.06], β = −0.45, ΔR^2 = 0.16)。最后，控制 3 个版本类型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负向预测作用仍显著(b = −0.17, SE = 0.04, t(50) = −3.85, p < 0.01, 95% CI = [−0.26, −0.08], β = −0.49, ΔR^2 = 0.23)。上述结果表明，2008 至 2020 年，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的下降趋势是稳健的。

3.2.2 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的变化量

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随年代的变化量(d_Z)计算方法同研究 1。首先，以大学生道德推脱 Z 分数为因变量(Y)，以年代为自变量(X)，从而建立回归方程：Y = BX + C (方程为 Y = −0.16X + 318.88)。其次，分别将年代 2008 和 2020 代入回归方程获得大学生道德推脱的 Z 分数 Z_{2008} 和 Z_{2020}。最后，计算 Z_{2020} 和 Z_{2008} 之差，再除以 12 年间的 Z 分数的平均标准差 1，即可得到 d_Z 值为−1.92 (d_Z = (Z_{2020} − Z_{2008})/1)。计算结果表明，12 年来大学生道德推脱下降了 1.92 个标准分。

接下来，为了考查 3 个不同版本量表各自的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变化量是否与合并后总的变化量接近，以排除不同版本量表的干扰作用，我们基于上述同样的方法，分别计算这 3 个版本量表各自的道德推脱水平随年代的变化量。它们依次为−1.80、−2.04 和−2.40 个标准分，与总的变化量 1.92 个标准分比较接近，这说明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 Z 分数的变化量是稳健的，未受 3 个不同版本量表的影响。

3.2.3 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与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水平的关系

滞后相关分析方法同研究 1。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均能负向预测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

4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近十余年来的变迁趋势，结果发现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均呈下降趋势。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在 2010 至 2021 年下降了 1.54 个标准分；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Z 分数)在 2008 至 2020 年下降了 1.92 个标准分。这两个年龄组被试的结果揭示了一个积极的变化：近十多年来大中学生群体的道德推脱水平降低了，符合道德提升模型。

我们采用滞后相关分析方法考查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宏观因素(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对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 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两类宏观社会因素均可以分别负向预测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趋势。具体而言，市场化指数、城镇化率、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和现行有效立法量与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都呈负相关。宏观社会因素的负向预测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社会的个体化水平提高了个体的自主责任意识，进而抑制人们的道德推脱倾向；社会正义水平以清晰的法规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限制人们实施道德推脱行为。

表 4　3 年前、1 年前和当年的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水平与大学生道德推脱的相关

社会成因	3 年前			1 年前			当年		
	β	t	p	β	t	p	β	t	p
社会的个体化水平									
市场化指数	−0.39	−3.09	< 0.01	−0.43	−3.46	< 0.01	−0.43	−3.40	< 0.01
城镇化率	−0.46	−3.71	< 0.01	−0.46	−3.71	< 0.01	−0.46	−3.74	< 0.01
离−结婚比率	−0.45	−3.62	< 0.01	−0.45	−3.66	< 0.01	−0.47	−3.83	< 0.01
社会正义水平									
现行有效立法量	−0.41	−3.22	< 0.01	−0.42	−3.35	< 0.01	−0.40	−3.13	< 0.01

注：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样本量为 54。

本研究首次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道德推脱水平发生的时代变迁。此前研究多从个体层面探讨道德推脱的发展趋势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例如，研究发现，道德推脱水平在青少年时期有所下降(Shulman et al., 2011)，尤其是在 14 至 16 岁之间下降明显(Hyde et al., 2010; Paciello et al., 2008)；而且不良的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等环境因素(微观社会生态系统)会引发更多的道德推脱行为(Caravita et al., 2014; Hyde et al., 2010)。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个体层面道德推脱的发展变化，且主要仅限于青少年阶段。本研究以中学生和大学生为被试群体来考查道德推脱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宏观水平上补充了有关道德推脱发展变化的研究证据及可能的宏观背景因素(宏观社会生态系统)。另外，两项研究所获结果的一致性有助于增强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下面从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影响因素、研究启示及不足等展开讨论。

4.1 道德推脱的变迁趋势

近 10 年来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趋势可从我国大学生责任心特质(田园 等, 2017; Peng & Luo, 2021)和共情能力(颜志强 等, 2017)的积极变迁趋势获得理解。基于特质激活理论(Tett & Guterman, 2000)，某些人格特质很可能会在相关情境线索下被激活，从而引发个体的道德推脱，这些人格特质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特质犬儒主义、外部心理控制源和道德相对主义(Cohen et al., 2014; Detert et al., 2008; Devereux et al., 2021; Egan et al., 2015; Moore et al., 2012; Newman et al., 2020)。然而，某些人格特质可能作用相反，如道德认同、道德理想主义、共情、内疚、诚实−谦逊、责任心和亲和性(Cohen et al., 2014; Detert et al., 2008; Grant, 2008; Moore et al., 2012; Ogunfowora & Bourdage, 2014; Ogunfowora, Nguyen, Steel, et al., 2022)。微观层面的证据表明，责任心和共情水平越强预示着个体更能抑制道德推脱倾向(de Angelis et al., 2016; Kish-Gephart et al., 2014; Lee et al., 2019)。因此，在宏观心理变迁趋势上，责任心和共情水平的提高预示着人们的道德推脱水平会呈现降低趋势。道德推脱会带来更多的不道德行为(Detert et al., 2008; Fida et al., 2022; Moore, 2015)，而道德推脱趋势的降低也就意味着不道德行为可能也会减少(至少是在未来变迁趋势上可能会如此)，这对于组织和社会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本研究获得的重要发现是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近十余年来呈现降低趋势。这虽然符合道德提升模型，但却并不能否定道德滑坡模型。或许两个模型都成立，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两个模型可能反映了社会道德水平的特定历史阶段特征，早期阶段呈下降趋势，而近 10 年来转变为上升趋势。例如，先前的研究证据支持道德滑坡模型可能是成立的(包刚升, 2012; 李新春, 陈斌, 2013; 孙立平, 2007)；而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治理和法制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官员贪腐行为和社会败德行为得到有力遏制，社会道德风气呈现向好趋势。滑坡模型和提升模型可能分别反映了社会道德水平“U”型变化模式的前后不同阶段。另一方面，两个模型也可能反映的是道德心理与行为的不同侧面。道德滑坡模型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态度判断(主要在社会层面)；而道德提升模型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自身道德素质的看法。此外，二者也可能是我国不同地区因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而导致的差异特征，这种地区差异也可以理解为它们在经历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例如，已有研究发现，人们的信任水平存在省际水平的地区差异，即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人们的信任水平越低(Xin & Xin, 2017)，这是因省区之间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导致的结果。以此类比，道德滑坡模型和道德提升模型可能揭示的是道德水平的地区差异特征，而实质上可能反映的是地区之间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特征。综合来看，近十余年来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下降趋势或许揭示的是社会道德水平“U”型变化模式的后一阶段特征。

4.2 道德推脱与社会宏观因素的关系

我们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这两类社会宏观因素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作用，拓展了道德推脱水平社会成因的解释。

社会个体化水平的可能影响。社会层面的“个体化”是我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个体化水平越高的社会中个体的自主责任意识越强。基于社会角色理论(Perrewé et al., 2004)，个体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其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会以社会期望的方式行动。个体化社会普遍期待人们采取自主负责的社会行动，这有助于限制人们作出推卸自身道德责任的行为。本研究选择的我国社会个体化水平的代理指标是市场化指数、城镇化率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它们分别从经济、社会与人际关系等角度来揭示个体化社会变迁。

首先，市场化水平从经济的角度来反映个体

化。市场经济发展既依赖于人的个体化, 也推动了人的个体化。市场化水平越高, 则越强调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互动, 并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市场交换)来实现个体化。其次, 城镇化水平从社会的角度来反映个体化。城镇化过程中, 人们通过接受和学习城市社会规则, 主动参与工业化劳动分工。城镇化也会提高人们的社会期望, 强化个体基于社会规则的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进而增强了个体化水平。最后, 结婚率与离婚率之比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反映个体化。离婚意味着关系的解体和感情的破裂, 使得个人走向独立化, 也增加了社会关系的“原子化”。这种人际关系原子化的程度体现为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的上升趋势(Grossmann & Varnum, 2015; Santos et al., 2017)。因此, 来自不同角度的个体化水平的上升趋势意味着人们可能因个体化社会的角色期望而通过增强自主责任意识来抑制自身的道德推脱行为。

社会正义水平的可能影响。现行有效立法量反映了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维护社会正义, 其随年代的上升趋势反映了国家法律体制完善的进程及社会正义水平的持续提高。基于情境力量理论(Knoll et al., 2016; Meyer et al., 2010; Smithikrai, 2008), 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情境力量, 是社会系统提供的关于个体行为适当性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社会正义水平越高则说明法律和道德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力越强(行为边界越清晰)。社会正义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防止或减少个体或群体的道德推脱行为。

4.3　研究启示和不足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是将道德推脱研究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社会变迁层面。一方面, 本研究明确了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 支持了道德提升假说。另一方面, 本研究基于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模型和社会生态心理学框架, 确证了社会的“个体化”变迁和制度性力量(社会正义)的增强对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下降趋势的解释作用。本研究具有宏观层面现实的政治意义和政策价值。其一, 它为新时代以来社会道德心理的向好趋势提供了证据, 今后应该继续强化法治中国建设, 提升社会正义水平; 其二, 虽然社会的个体化水平存在一些负面作用(王建民, 2013; 文军, 2012; 张良, 2017), 但也应认识到其积极意义, 那就是增强了人们内在的自主责任意识, 强调了自律性道德, 而非他律性道德, 减少了道德推脱。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策意义外, 本研究在微观层面还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具体而言, 本研究对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 学校德育要顺应新时代社会趋向个体化的现实, 在尊重学生的个体自我独立性的同时也要不断强化学生的自主责任意识, 培育学生养成自我负责的自觉意识和自主精神, 以减少学生推卸自身道德责任的行为; 另一方面, 要积极维护学校环境的公平正义, 弘扬社会正义, 引导学生崇善向善,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义利观, 以减少学生因社会正义弱化或缺失而引发的道德推脱行为。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研究工作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 本研究只考察了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总维度的变迁趋势, 未检验 8 种具体推脱机制的变迁。这是因为已有文献通常只提供了总量表的描述统计, 缺少 8 个具体维度的数据。尽管如此, 鉴于道德推脱各维度之间的具有一致的心理机制和一定程度的共变性(Bandura et al., 1996a; Caprara et al., 2009), 这可能预示着道德推脱各维度与总分有相似的变迁趋势。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累积更大范围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维度层面的变迁趋势分析, 提供明确的研究证据。其次, 道德推脱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但因数据量的限制, 本研究未能考查其对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变迁趋势的调节作用, 未来研究可通过积累更多数据来检验。最后, 道德推脱只是应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行为策略, 其变迁趋势是否能类推到道德情绪、道德认同、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其他道德心理变量, 还尚未可知,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社会变迁视角探讨这些道德心理内容的变迁。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探究了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近 10 年来的变迁趋势, 结果发现: (1)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均呈现逐年降低趋势; (2)社会个体化水平和社会正义水平的上升趋势负向预测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

参 考 文 献

(注: 两项研究中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较多, 此处未列出, 感兴趣的读者请访问 https://osf.io/x27uz/)

Aquino, K., Reed, A., Thau, S., & Freeman, D. (2007). A grotesque and dark beauty: How moral identity and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fluenc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wa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3), 385−392.

Ayala, F. J. (2010). The difference of being human: Mor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Suppl. 2), 9015−9022.
Baker, U. (2011). *Individualization* (translated by Li, R. 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贝克. (2011). *个体化* (李荣山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andura, A. (1990). Selective activation and disengagement of moral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6*(1), 27−46.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a).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364−374.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b). Multifaceted impact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on academic functioning. *Child Development*, *67*(3), 1206−1222.
Bandura, A., Caprara, G. V., Barbaranelli, C., Pastorelli, C., & Regalia, C. (2001). Sociocognitive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s governing transg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1), 125−135.
Bao, G. S. (2012). Market economy is not the root cause of moral collapse. *Inheritance & Innovation,* (15), 90−91.
[包刚升. (2012). 市场经济不是道德溃败的根源. *传承,* (15), 90−91.]
Boardley, I. D., & Kavussanu, M. (200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port scale.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9*(5), 608−628.
Cai, H. J., Huang, Z. H., Lin, L., Zhang, M. Y., Wang, X. O., Zhu, H. J., ... Jing, Y. M. (202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0), 1599−1688.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88.]
Cai, H. J., Yuan, J. Q., Su, Z., Wang, X. O., Huang, Z. H., Jing, Y. M., & Yang, Z. Y. (2022). Does economic growth raise happines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reexamin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21089804
Camilleri, L., Gill, P. R., & Jago, A. (2020).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nimal empathy in the meat paradox.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4*(5), 110103.
Caprara, G. V., Fida, R., Vecchione, M., Tramontano, C., & Barbaranelli, C. (2009). Assessing civic moral disengagement: Dimensiona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5), 504−509.
Caravita, S. C. S., Sijtsema, J. J., Rambaran, J. A., & Gini, G. (2014). Peer influences on moral disengagement in lat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2), 193−207.
Chen, A., Treviño, L. K., & Humphrey, S. E. (2020). Ethical champions, emotions, framing, and team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3), 245−273.
Chen, M., Chen, C. C., & Sheldon, O. J. (2016). Relaxing moral reasoning to win: How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elates to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8), 1082−1096.
Chi, L. P., & Xin, Z. Q. (2020). Cross-temporal change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8*(2), 95−103.
[池丽萍, 辛自强. (2020). 各类人群社会心理的时代变迁. *心理技术与应用*, *8*(2), 95−103.]
Cohen, T. R., Panter, A. T., Turan, N., Morse, L., & Kim, Y. (2014). Moral character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5), 943−963.
Cummins, R. A. (1995). On the trail of the gold standard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5*(2), 179−200.
de Angelis, G., Bacchini, D., & Affuso, G. (2016). The mediating role of domain judgemen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ig five and bullying behaviou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16−21.
de Waal, F. B. M. (2008).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1), 279−300.
Detert, J. R., Treviño, L. K., & Sweitzer, V. L. (2008). Moral disengagement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 study of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2), 374−391.
Devereux, P. G., Miller, M. K., & Kirshenbaum, J. M. (2021). Moral disengagement, locus of control,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late to adherence to COVID-19 guidelin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2*, 111069.
Dou, Y. G. (2008). Legal justice and moral justice. *Studies in Ethics,* (1), 57−62+72.
[窦炎国. (2008).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伦理学研究,* (1), 57−62+72.]
Egan, V., Hughes, N., & Palmer, E. J. (2015).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dark triad, and unethical consumer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6*, 123−128.
Fan, G., Wang, X. L., & Ma, G. R. (2011).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process to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6*(9), 4−16.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2011).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研究*, *46*(9), 4−16.]
Fan, G., Wang, X. L., Zhang, L. W., & Zhu, H. P. (2003). Report on the relativ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8*(3), 9−18+89.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朱恒鹏. (2003).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经济研究*, *38*(3), 9−18+89.]
Feng, L. (2014).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2), 20−27.
[冯莉. (2014). 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及其政治意义. *社会科学,* (12), 20−27.]
Fida, R., Ghezzi, V., Paciello, M., Tramontano, C., Dentale, F., & Barbaranelli, C. (2022). The implicit componen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pplying the relational responding task to investigate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eating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8*(1), 78−94.
Fu, T., T., Li, P., & Ye, T. (2020). Empathy and cyberbullying in college students: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8*(2), 104−113.
[符婷婷, 李鹏, 叶婷. (2020). 共情和网络欺凌: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心理技术与应用*, *8*(2), 104−113.]
Ge, Y. N. (2017). Three gateways to modern social justice theory. *Academic Exchange,* (10), 49−55.
[葛宇宁. (2017). 现代社会正义理论的三种基本进路. *学术交流,* (10), 49−55.]
Gini, G., Pozzoli, T., & Hymel, S. (2014).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children and you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inks to aggressive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40*(1), 56−68.

Gino, F., Schweitzer, M. E., Mead, N. L., & Ariely, D. (2011). Un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How self-control depletion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2), 191−203.

Goldberg, L. R. (1990). An alternative "description of personality":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6), 1216−1229.

Graca, J., Calheiros, M. M., & Oliveira, A. (2016). Situating moral disengagement: Motivated reasoning in meat consumption and substitu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353−364.

Grant, A. M. (2008). Does intrinsic motivation fuel the prosocial fire? Motivational synergy in predicting persistenc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1), 48−58.

Greenfield, P. M. (2016). Social change, cultural evolu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84−92.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W. (2015). Social structure, infectious diseases, disasters, secula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meric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3), 311−324.

Haidt, J. (2007).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316*(5827), 998−1002.

Hamamura, T. (2012). Are cultures becoming individualistic? A cross-tempor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1), 3−24.

Hamamura, T. (2020). Cross-temporal changes in people's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behaving.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2*, 17−21.

Hannah, S. T., Avolio, B. J., & May, D. R. (2011). Moral maturation and moral conation: A capacity approach to explaining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4), 663−685.

Harris, L. C., & He, H. (2019). Retail employee pilferage: A stud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9*, 57−68.

Hillebrandt, A., & Barclay, L. J. (2020). How cheating undermines the perceived value of justice in the workpla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ham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10), 1164−1180.

Hoffman, M., Yoeli, E., & Nowak, M. A. (2015). Cooperate without looking: Why we care what people think and not just what they d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6), 1727−1732.

Huang, W. Y. (2022). *Ten years'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Retrieved August 2, 2022, from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14100.html

[黄文艺. (2022). *中国法治建设的十年成就*. 2022-8-2 取自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14100.html]

Huang, Y. S. (2012). Xunzi's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 135−141.

[黄玉顺. (2012). 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社会科学研究*, (3), 135−141.]

Hyde, L. W., Shaw, D. S., & Moilanen, K. L. (2010). Developmental precursor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8*(2), 197−209.

Kavussanu, M., & Stanger, N. (2017). Moral behavior in spor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6*, 185−192.

Killen, M., & Smetana, J. G. (2013).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2nd e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Kish-Gephart, J., Detert, J., Treviño, L. K., Baker, V., & Martin, S. (2014). Situational moral disengagement: Can the effects of self-interest be mitigate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5*(2), 267−285.

Knoll, M., Lord, R. G., Petersen, L.-E., & Weigelt, O. (2016). Examining the moral grey zone: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uthenticity, and situational strength in predicting unethical managerial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6*(1), 65−78.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4), 1073−1137.

Lee, J. J., Hardin, A. E., Parmar, B., & Gino, F. (2019). The interpersonal costs of dishonesty: How dishonest behavior reduces individuals' ability to read others' emo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9), 1557−1574.

Lee, K., Kim, E., Bhave, D. P., & Duffy, M. K. (2016). Why victims of undermining at work become perpetrators of undermining: An integrative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6), 915−924.

Leidner, B., Castano, E., Zaiser, E., & Giner-Sorolla, R. (2010). Ingroup glorificati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collective viol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8), 1115−1129.

Li, J. D., & Luo, L. W. (2004). Economic analysis of moral conduct—Moral theory of new-marxism economic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9*(3), 107−115.

[李建德, 罗来武. (2004). 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新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德理论. *经济研究*, *39*(3), 107−115.]

Li, J. Y., & Raine, J. W. (2014). The time trend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6*(2), 409−427.

Li, X., Lv, H. Y., & Li, G. F. (2020). Study on the change of moral sensitivity, moral threshold and moral bottom line.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0*(7), 5−13+254.

[李侠, 吕慧云, 李格菲. (2020). 道德敏感性、道德阈限与道德底线的变迁. *江西社会科学*, *40*(7), 5−13+254.]

Li, X. C., & Chen, B. (2013). Explosive enterprise immoral actions and ineffec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roduct safety and regula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8*(10), 98−111+123.

[李新春, 陈斌. (2013). 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与管制失效——对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管的制度分析. *经济研究*, *48*(10), 98−111+123.]

Li, Y. N. (2010). *Surpassing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On the role of moral power in econom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厉以宁. (2010).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修订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Luan, Y. X., Zhao, K., Wang, Z. Y., & Hu, F. (2022).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of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2-05269-w

Ma, T.-L., Meter, D. J., Chen, W.-T., & Lee, Y. (2019). Defending behavior of peer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and cyber contex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individual and peer-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9), 891−928.

Machackova, H. (2020). Bystander reactions to cyberbullying and cyberaggression: Individual, contextual, and social factor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6*, 130−134.

Mazar, N., & Aggarwal, P. (2011). Greasing the palm: Can collectivism promote bribe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7),

843−848.
Meyer, R. D., Dalal, R. S., & Hermida, R. (2010).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situational strength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1), 121−140.
McAlister, A. L. (2001). Moral disengagement: Measurement and modific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8*(1), 87−99.
Moore, C. (2015). Moral disengagemen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6*, 199−204.
Moore, C., Detert, J. R., TreviÑo, L. K., baker, V. L., & Mayer, D. M. (2012). Why employees do bad thing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ersonnel Psychology*, *65*(1), 1−48.
Moore, C., & Gino, F. (2013). Ethically adrift: How others pull our moral compass from true north, and how we can fix it.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3*, 53−77.
Moore, C., Mayer, D. M., Chiang, F. F. T., Crossley, C., Karlesky, M. J., & Birtch, T. A. (2019). Leaders matter morally: The role of ethical leadership in shaping employee moral cognition and miscondu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4*(1), 123−145.
Newman, A., Le, H., North-Samardzic, A., & Cohen, M. (2020). Moral disengagement at work: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67*(3), 535−570.
O'Fallon, M. J., & Butterfield, K. D. (2005).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iterature: 1996−2003.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9*(4), 375−413.
Ogunfowora, B., & Bourdage, J. S. (2014). Does honesty-humility influence evaluations of leadership emerg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6*, 95−99.
Ogunfowora, B., Nguyen, V. Q., Lee, C., Babalola, M., & Ren, S. (2022). Do moral disengagers experience guilt following workplace misconduct? consequences fo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 https://doi.org/10.1002/job.2668
Ogunfowora, B., Nguyen, V. Q., Steel, P., & Hwang, C. C. (2022).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theoretical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t work.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7*(5), 746−775.
Oishi, S. (2014). 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581−609.
Ou, H. L., Sun, B. H., Zhang, W. H., & Li, W. J. (2020).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of slippery slop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4), 650−660.
[欧红蕾, 孙炳海, 张文海, 李伟健. (2020). *勿以恶小而为之: 滑坡效应的心理机制及预防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8*(4), 650−660.]
Paciello, M., Fida, R., Tramontano, C., Lupinetti, C., & Caprara, G. V. (2008).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its impact on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in late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9*(5), 1288−1309.
Peng, L., & Luo, S. (2021). Impact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ersonality trait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2001−2016.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1*, 110461.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0.110461
Perrewé, P. L., Zellars, K. L., Ferris, G. R., Rossi, A. M., Kacmar, C. J., & Ralston, D. A. (2004). Neutralizing job stressors: Political skill as an antidote to the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role conflic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1), 141−152.
Pouwels, J. L., van Noorden, T. H. J., & Caravita, S. C. S. (2019). Defending victims of bullying in the classroom: The rol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4*, 13.
Reynolds, S. J., Dang, C. T., Yam, K. C., & Leavitt, K. (2014). The role of moral knowledge in everyday immorality: What does it matter if I know what is righ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3*(2), 124−137.
Santos, H. C., 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2017). Global Increases in Individual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9), 1228−1239.
Sharvit, K., Brambilla, M., Babush, M., & Colucci, F. P. (2015). To feel or not to feel when my group harms others? The regulation of collective guilt as motivated reason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9), 1223−1235.
Sheldon, K. M., Sommet, N., Corcoran, M., & Elliot, A. J. (2018). Feeling interpersonally controlled while pursuing materialistic goals: A problematic combination for mor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9), 1330−1349.
Shulman, E. P., Cauffman, E., Piquero, A. R., & Fagan, J. (2011).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rally disengaged attitudes and offen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6), 1619−1632.
Smithikrai, C. (2008). Moderating effect of situational streng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u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4), 253−263.
Song, H. B. (2009). How to ensure the moral bottom line of society?—On the inherent logic of Legalist morality-politic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2), 47−53.
[宋洪兵. (2009). 如何确保社会的道德底线?——论法家道德-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哲学研究,* (12), 47−53.]
Sun, C. C. (2013). Why Hayek opposes "social justice". *Studies in Ethics,* (5), 75−80.
[孙春晨. (2013). 哈耶克为什么反对"社会正义". *伦理学研究,* (5), 75−80.]
Sun, L. P. (2007). *Guarding the bottom line: The basic order of social life in transi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孙立平. (2007). *守卫底线: 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Tang, C. (2005). The change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 202−209.
[唐灿. (2005).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浙江学刊,* (2), 202−209.]
Teng, Z. J. (2018). *Violent video games effect on moral cogni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滕召军. (2018). *暴力电子游戏对青少年道德认知的影响* (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Tett, R. P., & Guterman, H. A. (2000). Situation trait relevance, trait expression, and 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 Testing a principle of trait activ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4*(4), 397−423.
Tian, Y., Ming, H., Huang, S. L., & Sun, L. (2017). Changes i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in 2004~2013: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1), 30−36.

[田园, 明桦, 黄四林, 孙铃. (2017). 2004 至 2013 年中国大学生人格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1), 30−36.]

Treviño, L. K., den Nieuwenboer, N. A., & Kish-Gephart, J. J. (2014). (Un)Ethic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635−660.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 Carter, N. T. (2014). Declines in trust in others and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among american adults and late adolescents, 1972−2012.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0), 1914−1923.

van Lange, P. A. M., & Rand, D. G. (2022). Human cooperation and the crises of climate change, COVID-19, and misin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3*(1), 1−24.

Wang, J. M. (2013). 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The issue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Thinking*, *39*(3), 79−83.

[王建民. (2013).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思想战线*, *39*(3), 79−83.]

Wang, X. C., & Yang, J. P. (2010).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in Chines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2), 177−179.

[王兴超, 杨继平. (2010).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77−179.]

Wang, X. C., Yang J. P., & Gao, L. (201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ivic moral disengament scale.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1*(6), 838−842.

[王兴超, 杨继平, 高玲. (2013). 公民道德推脱问卷的中文版修订.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6), 838−842.]

Wang, X. C., Yang, J. P., & Yang, L. (2014).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7), 1092−1102.

[王兴超, 杨继平, 杨力. (2014). 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2*(7), 1092−1102.]

Wang, Y. A., & Todd, A. R. (2021). Evaluations of empathizers depend on the target of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1*(5), 1005−1028.

Welsh, D. T., Ordonez, L. D., Snyder, D. G., & Christian, M. S. (2015). The slippery slope: How small ethical transgressions pave the way for larger future transgres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1), 114−127.

Wen, J. (2012). The coming of individualized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clusion polic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 81−86.

[文军. (2012).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社会科学,* (1), 81−86.]

Xie, C. X. (2018). *Modern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empty shell: The social change of a contemporary village in northwest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解彩霞. (2018). *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Xin, Z. Q. (2019). Market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decline in China.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2), 1951−1966.

[辛自强. (2019). 市场化与人际信任变迁. *心理科学进展*, *27*(12), 1951−1966.]

Xin, Z. Q., & Chi, L. P. (2020). The changing trend of mental healt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Tribune,* (1), 46−50.

[辛自强, 池丽萍. (2020). 当代中国人心理健康变迁趋势. *人民论坛,* (1), 46−50.]

Xin, Z. Q., & Li, Z. (2020). The change of Chinese citizens' financial values and its impact on financial welfar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3*(1), 41−48.

[辛自强, 李哲. (2020). 我国公民财经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对财经福祉的影响. *心理研究*, *13*(1), 41−48.]

Xin, Z. Q., & Xin, S. F. (2017). Marketization process predicts trust decline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62*, 120−129.

Yan, Y. X. (2016).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ranslated by Lu, Y.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阎云翔. (2016).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陆洋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an, Y. X. (2019). Trajectories of mo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inking*, *45* (1), 93−105.

[阎云翔. (2019).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思想战线*, *45*(1), 93−105.]

Yan, Y. X. (2021). "Live for yourself" or "live your own way"—Rethinking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individualized proposition.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0), 46−59+177−178.

[阎云翔. (2021). "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 *探索与争鸣,* (10), 46−59+177−178.]Yan, Y. X., & Lang, S. (2016).

The mor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 38−63.

[阎云翔, 郎帅. (2016). 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 *中国战略报告,* (1), 38−63.]

Yan, Y. X., & Xu, D. W. (2010).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moral landscape in the reform era. *Journal of Ethnology*, *1*(2), 1−12+160.

[阎云翔, 徐大慰. (2010).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学刊*, *1*(2), 1−12+160.]

Yan, Z. Q., Su, J. L., & Su, Y. J. (2017). Increasing empath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5*(10), 578−585.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7). 共情的时代变迁: 一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心理技术与应用*, *5*(10), 578−585.]

Yang, J. H., & He, Z. H. (2014). Continuity or change? Chi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al era. *Population Research*, *38*(2), 36−51.

[杨菊华, 何炤华. (2014).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人口研究*, *38*(2), 36−51.]

Yang, J. P., & Wang, X. C. (2012). Effec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on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8), 1075−1085.

[杨继平, 王兴超. (2012).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44*(8), 1075−1085.]

Yang, W. D., & Liang, S. (2022). Review on Bandura's theory of moral dis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5*(2), 121−125.

[杨文登, 梁爽. (2022). 班杜拉的道德推脱理论综述. *心理研究*, *15*(2), 121−125.]

Yang, X. J. (2015). *Contemporary elderly famil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urban society*. Shanghai People's Press.

[杨雪晶. (2015). *城市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老年家庭*. 上海人民出版社.]

Yao, D. Z. (2013). A program of social justic. *Academic Monthly*, *45*(11), 59−64.

[姚大志. (2013). 社会正义论纲. *学术月刊*, *45*(11), 59−64.]

Ye, H. (2012). Social dilemma and social justice in public coopera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7*(8), 132−145.

[叶航. (2012). 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 *经济研究*, *47*(8), 132−145.]

Zaki, J. (2020). Integrating empathy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1*(1), 517−540.

Zeng, R., & Greenfield, P. M. (2015). Cultural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 Using the Google Ngram Viewer to stud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 cultural val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47−55.

Zhang, L. (2017).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张良. (2017). *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ang, Y., & Xin, Z. Q. (2019). Rule comes first: The influences of market attributes on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5*(1), 286−313.

Zhao, S. (2011). Emergence and its conditions in china individualization—Review of correlated theories of individualization. *Journal of Chang'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3*(2), 68−75.

[赵爽. (2011). 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产生及其条件——个体化相关理论述评.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2), 68−75.]

Zheng, F. X. (2011). From custom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 moral responsibility——The modern change of western responsibility ethics thought. *Studies in Ethics* (3), 47−51.

[郑富兴. (2011). 从习俗伦理责任到道德责任——西方责任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变迁. *伦理学研究*(3), 47−51.]

Zhou, W. S. (2004). On the cause and realization of legal justice. *Law Review, 22*(1), 36−41.

[周旺生. (2004).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学评论*, *22*(1), 36−41.]

Zhu, H. Y., Huang, X. Y., Chai, Y. F., Xue, R. T., Song, Z. Y., Jiang, J. Q., & Qian, M. Y. (2022). The current state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counselor advertising—Study of counseling advertising based on originating from the internet.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0*(2), 493−498.

[朱焕雅, 黄学勇, 柴莹飞, 薛若彤, 宋珍玉, 蒋婧琪, 钱铭怡. (2022). 心理咨询师广告伦理规范现状——基于来源于网络的心理咨询广告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2), 493−498.]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es of changes and macro causes in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ANG Xiangkun[1], XIN Ziqiang[2], HOU You[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1517,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Moral disengagement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tendency for an individual to break away from moral self-regulation. People who are morally disengaged often look for an excuse for their immoral behavior.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erea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diachronic change and the associated macro causes, particularly in China. To address these research gaps,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 or change on the social time scale and that such trends are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caused by macrosocial change during a specific period.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the present research, composed of two separate studies, examine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existing studies by conducting two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es, using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developed by Bandura and Caprara et al. The current research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macro indicators that reflect the levels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of the society.

In Study 1,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79 valid articles using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developed by Bandura et al.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2010 to 2021, with 60, 478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volved as participants. Focused on college students, Study 2 was conducted based on 54 valid papers, using both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compiled by Bandura et al. and the citizen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developed by Caprara et al.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gleaned from 2008 to 2020, involving 34, 224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10 to 2021,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progressively (Study 1); (2) from 2008 to 2020,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lso declined gradually (Study 2). In the two studies, moreover, the decreasing

trend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ere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China's rising individualization (including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divorce-to-marriage ratio) and social justice (the amount of current effective legislation).

In conclusion, China has witnessed the reduction in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ast decade. Furthermore, it was found that such declines wer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s in China's individualization (emphasizing individual autonomous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behavior) and social justice (representing more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behavior) during this period. Taken together,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y expanding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macro-social lev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Keywords moral disengagement, individu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college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cial change,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